

邓发之子邓北生深情回忆父亲生平点点滴滴

“父亲为邓小平卓琳牵红线”

80年前,广州起义者泪别妻儿,前赴后继,英勇战斗,80年过去了,英雄们的后人过得怎么样?他们如何理解父辈们当年的牺牲奋斗?在广州起义80周年之际,记者特别寻访部分参加广州起义英雄的后人,请他们讲述英雄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。

邓发牺牲时,邓北生还不满两岁,对于父亲的了解都是来自于长辈们的讲述。父亲的一些小故事,让邓北生几十年来记忆犹新。因为战争年代的颠沛流离,邓发只有在延安的时候,才与邓北生共度了短暂而温馨的一年多。邓北生透露,邓小平和卓琳的结合,就是邓发牵的红线。他还一手操办了邓小平的婚礼,宴客的时候,知道邓小平不怎么喝酒,邓发还挡在新郎前面替他喝酒。

机智:甘蔗当枪吓退特务

邓北生是邓发最小的儿子,排行第五,1944年生于延安。现任广东华侨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、总经理,广东华侨信托投资(香港)有限公司董事长。讲起父亲当年的“威猛”,邓北生难掩自豪。在香港搞地下工作期间,邓发免不了被一些叛徒特务跟踪。有一次,他又被一个叛徒盯上了,走了好长一段路都甩不开。“很多人遇到这些情况,都选择躲起来或者撒开腿逃跑。可父亲却反其道而行之。他冷不丁地转身朝叛徒走去,还未等那人反应过来,迅速从裤袋里掏出一节甘蔗,朝叛徒身上一捅,说‘赶快走,再不走小心我打死你’。那个特务以为是枪,吓得连滚带爬地跑开了。”

如果说“甘蔗驱叛徒”体现了邓发的果敢,那么“急敲对家门”则让邓发的机智展露无遗。当时,邓发要去香港

铜锣湾篱园党的地下印刷机关检查工作,那时候的所谓“机关”,都是隐藏在普通民宅之中的。快到门口他才发现,印刷机关已经被国民党特务破坏了,这群人正在里面等候着共产党员“自投罗网”呢。他马上或者转身走,身份都会马上暴露。邓发急中生智,若无其事地敲了对面民宅的大门,但还是引起了特务的怀疑,问他是干什么的。“我从乡下来,找我大哥,可好像找错地方了!”邓发操着一口云浮土话,故作焦急地回答。国民党特务“宁可错杀一万,不可放过一个”,还是把邓发关进了监狱。

关押期间,敌人几次审问他,并把他痛打一顿,邓发始终一脸无辜地坚称自己是找大哥,敌人只好把他送到普通牢房里。在狱中,邓发得到一名给犯人送饭的妇女的帮忙,给哥哥邓芳带了个信儿。当时邓芳的确在英国船上当厨工,为了让特务相信,邓发还特意让英国老板前往监狱作证。特务们一看,兄弟俩长得像,英国人也证实邓芳只是普通厨工,挥挥手让邓发走了。

英勇:广州起义主动请缨

1927年12月11日,邓发参加了起义,并且担任广州工人赤卫队五区副指挥。12月12日,国民党反动派军队与帝国主义勾结,对起义军进行围攻反扑。邓发在危急之时,主动要求率领工人赤卫队到广州长堤一带阻击敌人,掩



邓北生翻看老照片时感慨万千

护起义部队撤退,英勇顽强地同多于自己数十倍、拥有精良武器的敌人浴血奋战。

13日下午,广州“四牌楼”一带枪声四起,邓发的四叔公邓北水家忽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,邓发的哥哥壮着胆去开门,闪身进来一个人,正是邓发!时隔多年后,邓北生在亲人们的讲述中,得知了后来惊心动魄的一幕。“当时,起义军都是佩戴红领巾作为识别的,一下雨,脖子上就会染上一圈红色。反动派一看到脖子上有红印子的人,必杀无疑!”邓北生说,邓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脏衣服藏到水井底,把脖子上的红印擦掉。又叫家人翻出几张旧处方纸,将痰盂里的脏水倒到床边,撒上些炉灰。然后,他便装成病人,奄奄一息倒在床上。整理妥当不到半个小时,敌人就凶神恶煞地进来了。见到躺在床上的邓发,便问是什么人。邓发的哥哥说:“是我弟弟,得了肺病。”肺病在当时可谓绝症,又是传染病,敌人一听,赶忙避之大吉。

谈到广州起义对于父亲



邓发拍摄的延安时期邓小平与卓琳等人的合影

的意义,邓北生说:“广州起义时,邓发只有21岁,还不是领导人之一,只能算个普通的基层干部。但他在广州起义中获得了许多斗争经验,迅速成长成熟起来。”邓北生认为,广州起义是邓发参与的第一次武装斗争。在此之前,他虽然参加过香港海员罢工和省港大罢工,但那些都是政治斗争。“发动广州起义的时候,实际上很多条件都不具备,起义军没有精良的武器装备、缺乏后勤支援,也得不到军队的支持,有的只是对革命的满腔热情和不怕牺牲的精神。广州起义用她最终的失败告诉了包括父亲在内的革命者,要从农村包围城市,要有自己训练有素的武装部队。”邓北生说。

平实:白切鸡手艺让人赞

邓发是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工人领袖,在革命事业中,他有着钢铁一般坚定的意志。然而在生活中,他也有着柔情细腻的一面。在延安的时候,他给人印象最深的竟然是“大厨”身份。“听母亲说,每

到周末,父亲经常会做广东名菜白切鸡、烤乳猪,手艺好得让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啧啧赞叹。”邓北生说,直到1996年,杨尚昆在“四·八烈士”牺牲50周年之际回到延安时,还指着一口井告诉众人:“当年邓发就是在这口井旁边烤乳猪给大家吃的!”当时美军有个观察组在延安,经常会送些罐头和冰淇淋过来,邓发自创了一道“火烧冰淇淋”,就是用面粉裹着冰淇淋,再速炸起锅。“火烧冰淇淋”即使放到现在,也是一道颇为流行的菜式。

在一次又一次的锤炼中,邓发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。1931年,他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国家保卫局局长,保卫中央机关领导人的安全。在他担任保卫局局长期间,没有发生一例中央领导人因保卫疏漏而落入敌方之手的事件。

影响:勤俭自强子女谨记

“这应该是我父亲最经典的合影了。”邓北生所说的“经典合照”,是邓发1945年

9月代表解放军80万职工参加在法国举行的第27届世界职工代表大会,出发前在延安机场抱着儿子所摄。归国后,他直接飞往重庆。1946年4月初,邓发接到通知,要他到巴黎参加世界工联理事会。他打算回延安向毛主席、党中央汇报后再去巴黎开会。1946年4月8日,邓发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,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。

“事后,人们怀疑是国民党反动派在飞机上安装了磁铁,影响了飞机的仪表盘。从那之后的国共谈判期间,中共中央领导乘坐的飞机,必须有相应级别的国民党官员同在。另外,众多中央领导同乘一架飞机的现象也很少了。”邓北生说。

虽然邓发遇难时,邓北生童蒙未启,然而父亲对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。“父亲曾经跟母亲说过,要让这孩子记住‘你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,你的父母都是工人’。”邓北生说,这句话伴随了他的一生,让他养成了勤俭节约自强不息的品质。“我和姐姐金娜读书、工作,靠的全是自己的努力。”

邓发(1906~1946)

广东云浮人,中国工人运动先驱,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,中国共产党保卫工作和干部教育事业的开拓者。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。1929年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,同年11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、组织部长,兼任中共香港市委书记。1930年9月,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。1946年4月8日,从重庆返回延安途中,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。据《广州日报》

“纳粹追捕者”揭秘日军细菌战梦魇

81岁的美国皮肤病学专家迈克尔·弗兰兹布劳步履蹒跚走在中国土地上,这位年过八旬的“纳粹追捕者”,用他55年的职业素养,揭秘65年前发生在浙江农村千百名无辜民众身上的梦魇。

他的追捕对象是“731”。经过数天实地寻访,9日,他到宁波,与当地相关人士进行交流。

从“纳粹追捕者”到“731追捕者”

弗兰兹布劳是犹太人,1926年出生在美国汽车城底特律,1952年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。现在,他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皮肤病学教授,并且是世界医学协会会员。

弗兰兹布劳是一名“纳粹追捕者”,长期追踪纳粹分子中的漏网之鱼。最令他自豪的一件事,是经过15年追踪扯下德国医生汉斯·斯沃林身上的羊皮,这个纳粹党卫军的医生曾为“纯种”实验而折磨死300个儿童。

决不能容忍医生用医术进行谋杀,我们对谋杀者的追诉不受法律时效限制。”弗兰兹布劳说。

1995年,弗兰兹布劳阅读了美国诺里奇加州州立大学哈里斯·谢尔顿教授揭露日军731部队罪行的著作《死亡工厂》。他深感:“日军731部队犯下了不亚于纳粹的罪恶。”1996年开始,弗兰兹布劳

每年向世界医学会年会提交决议案,要求日本医学会谴责罪行的罪行,然而每次遭到否决。

尽管右腿因骨折安装了人工关节,行走不便,但弗兰兹布劳坚持再次访问中国。他表示,我们必须把这样的罪行公诸于众,特别是公诸于国际医学界。”

这令人想起他年轻时的一段从军经历,1945年,向往做战斗机飞行员的弗兰兹布劳加入美国空军,在菲律宾服役。但他在军队没有实现飞翔梦想,却开启了从医之路。他在菲律宾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医技工作,退役后考入密歇根大学。

揭秘是特殊出诊

11月30日,甫抵上海的弗兰兹布劳教授不顾劳累,在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等人陪同下,开始了第二次揭秘之旅。

2002年3月,弗兰兹布劳、哈里斯以及美国病理学家马丁·法曼斯基医生第一次到浙江寻访日军细菌战受害者。如今,哈里斯已作古,弗兰兹布劳在交谈中不时提起这位朋友:“我是读了《死亡工厂》以后开始追查日军细菌战历史的,我有责任把谢尔顿教授的事业继续下去。”

金华市汤溪镇方家村74岁的盛樟法老人,清楚地记得日军有如蝗虫来袭的一幕,还能用手比划出飞机俯冲投弹的姿态:农历四月十二,下午

5点多钟,日军到了我们村,大家都逃命了。他们把鸡、鸭、牛、猪杀光吃光,不过只杀红色和黄色鸡,不杀黑鸡。临走时,还在米谷菜油里拉屎撒尿。四月廿四日早上,有8架飞机来轰炸,其中5架机关枪哒哒哒地响,还有3架各自丢了一个炸弹,就飞走了。”

灾难就此开始。78岁的盛利银捋起裤腿,让美国医生看他右小腿上碗大的伤痕,这在当地被称作“烂脚病”:外面一圈皮肤是黑色,里面一圈是红色,核心则是一块黄黑色伤疤。“一开始起了一个小疱,后来就破了伤口,一直烂到骨头。我们家花了五六担米,带我到边上的龙游县找到一个退伍的军医。他把烂骨头挖掉,再涂药包好,军医说我是中了日本人的‘毒气’。我们村里还有两个人,没有钱医,后来烂脚一直到死。”

在汤溪镇老年大学,探访者一行见到了至今仍在受折磨的80岁李妹头。她右小腿上的伤口一直溃烂到去年……

年过八旬的弗兰兹布劳穿西装,打领结,戴礼帽。我执业时必须穿正装,因为这位代表医生对病人的尊重,也能让病人对医生产生信任感。在我心目中,这次调查就是一次特殊的出诊。”

日军使用鼻疽菌铁证如山

弗兰兹布劳向每一位幸存者频频发问。他解释说,这些回忆很重要,因为从现在的

伤口已很难找到当时的病菌,我们必须通过他们的回忆来判断日军使用了何种细菌武器。我发现他们的回忆惊人一致,足以证明日本飞机在当地投放了含有细菌武器的炸弹。”

这些受害者是在1942年5月至9月由日军发动的浙赣战役中遭祸的。

同一年的4月18日,25架美军B-25式轰炸机在吉米·杜立特中校指挥下,首次轰炸东京,大部分飞行员随后飞往中国,因油料不够在浙江沿海跳伞并获救。日军生怕美军接下来会利用浙江西部衢州机场轰炸日本本土,在作战时悍然使用细菌武器。

汤溪镇72个村有69个村发现烂脚病人。汤溪镇退休中学教师傅自律说,他在汤溪镇所在的金华市婺城区进行了调查,到今年7月10日止,共查出511人,其中362人已死亡,幸存者149人,其中还烂着的55人,留疤的94人。”

真实数据应该是调查所得数的三倍。”

经过五天寻访,弗兰兹布劳认为,与人们更熟悉的炭疽相比,日军在浙赣战役中广泛使用了鼻疽武器。弗兰兹布劳说,法曼斯基医生提供给我鼻疽的大量病理学资料显示,它对人体组织的破坏作用很大,会导致成片肌肉腐烂脱落,而且会带来严重的痛苦。我判断我探访的受害者患的是鼻疽。”弗兰兹布劳告诉记者,法曼斯基医生在华盛顿美

国国家档案馆发现,当时731部队曾大量培养鼻疽菌。

我认为,1942年沿浙赣线地区密集出现大批鼻疽患者,完全是人为因素。凶手就是日军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。”弗兰兹布劳断言。

纪念历史最好的方式是记录历史

在汤溪镇横山头村,弗兰兹布劳一行发现了令人惊喜的一幕:三位受害者——曹根贵、曹根松兄弟以及戴森森的伤口痊愈了。92岁的曹根贵告诉他,是去年打了七个月的青霉素针医好的。

幸存者逐年逝去。如何保证受害者的历史不被忘记?弗兰兹布劳认为:“中国的医学界应该加紧记录,这是最好的纪念历史方式。要让专家记录下这些历史,成为以后医学学生的伦理学和专业教材,只有这样,才会被一代代人记录下来。”

让弗兰兹布劳感到高兴的是,他有中国同行伙伴。金华第五医院的医生与他同行。王选说,这是中美两国医生第一次在一起研讨日军细菌战救助问题。

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的蒋亦秀医师说,她已经去世的外祖母也是烂脚病的受害者,“我小时候经常帮外婆换药洗袜子,所以我现在愿意帮细菌战的受害者做一些技术方面的工作。”

4日下午,弗兰兹布劳教

授和金华第五医院的皮肤科医生们进行了学术交流。他特意提醒中国同行:“鼻疽菌的传染性非常强,而且可以长期存活,请大家务必要注意这一点。”

金华第五医院田刚院长告诉记者,他们是在报纸上看到弗兰兹布劳教授来浙江调查的消息。他今年已经81岁了,还万里迢迢赶到中国来调查,这让我们非常感动,作为一所皮肤病专科医院,我们愿意在政策范围内提供技术上的支持。我们是中国的医院医生,应该为中国人做一些事。”

王选表示,细菌战历史仅靠民间研究是不够的,更多的要靠医学专业知识的 researcher 去发掘。我们现在已经找到300多个受害者,但缺乏理论上的解释,作为民间研究者,我们感到知识有限,希望能让医学工作者作深入的研究。我们愿意为他们复杂的研究提供基础数据。”

12月5日,弗兰兹布劳一行结束揭秘之旅,返回上海休息。

我已准备好一个幻灯片文件,回美国后要把这次搜集的新证据添加进去,向美国同行揭露这一令“医生”称谓蒙羞的罪行。我特别要教育我的年轻学生,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医德,医术只能救人不能杀人。”弗兰兹布劳说,明年的世界医学会年会上,我还将递交同样的议案!”

新华社杭州12月9日电 (记者 冯源)